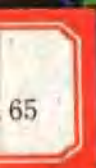


戴东原的哲学

胡适著译精品选
● 胡适 / 著



出版

的哲学

戴东原

胡适著译精品选
胡适 / 著

DAIDONGYUAN
DE
ZHEXUE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戴东原的哲学 / 胡适著. - 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1999. 10

(胡适著译精品选)

ISBN 7 - 5336 - 2284 - 7

I. 戴… II. 胡… III. 戴震 - 哲学思想 - 研究 N. B24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2258 号

责任编辑: 张崇贵

装帧设计: 包云鸿 吴元宗 王为民 黄彦

出版发行: 安徽教育出版社 (合肥市跃进路 1 号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排 版: 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

印 刷: 合肥晓星印刷厂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4.625

字 数: 100 000

版 次: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3 000

定 价: 9.00 元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 话: (0551) 2651321

邮 编: 230061

出版说明

胡适著述甚丰,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多有开创性的贡献。为满足读者的需要,本社在出版《胡适全集》之前,先行出版胡适在文学、史学、哲学等方面有代表性的著(译)作。这些著(译)作的出版,或采用初版作底本,或采用较善版本。书中个别有误植、脱字、衍字之处,均予改正。

《戴东原的哲学》原载 1925 年 12 月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,192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,1968 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,1986 年 7 月,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收入《胡适作品集》第 32 集。1991 年 12 月,北京中华书局收入“中国近代人物文集”丛书。附录《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》一文,原据许啸天编《国故学讨论集》第 4 集,1927 年上海群学社出版。

本书在整理过程中,吸收了一些胡适著作整理和研究成果,谨致谢意!

1999 年 6 月

目 录

[1] 戴东原的哲学

[1] 一、引论

[15] 二、戴东原的哲学

[59] 三、戴学的反响

[139]附 录

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

一、引 论

中国近世哲学的遗风，起于北宋，盛于南宋，中兴于明朝的中叶，到了清朝，忽然消歇了。清朝初年，虽然紧接晚明，已截然成了一个新的时代了。自顾炎武以下，凡是第一流的人才，都趋向做学问的一条路上去了；哲学的门庭大有冷落的景况。接近朱熹一脉的学者，如顾炎武，如阎若璩，都成了考证学的开山祖师。接近王守仁一派的，如黄宗羲自命为刘宗周的传人，如毛奇龄自命为得王学别传，也都专注在史学与经学上去了。北方特起的颜元、李塨一派，虽然自成一个系统，其实只是一种强有力的“反玄学”的革命；固然给中国近世思想史开了一条新路，然而宋明理学却因此更倒霉了。这种“反玄学”的运动是很普遍的。

顾炎武、黄宗羲、黄宗炎、阎若璩、毛奇龄、姚际恒、胡渭，都是这个大运动的一分子，不过各人专力攻击的方向稍有不同罢了。

约略说来，当日“反玄学”的运动，在破坏的方面有两个趋势：一是攻击那谈心说性的玄学；一是攻击那先天象数的玄学。清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就兼有这两种趋势。他对于那高谈心性的玄学，曾说：

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，其行在孝弟忠信，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，其文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；其用之身，在出处、去就、交际；其施之天下，在政令、教化、刑法。虽其和顺积中，而英华发外，亦有体用之分，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。

——《日知录》十八

他又说当日的理学家：

不习六艺之文，不考百王之典，不综当代之务；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，而曰“一贯”，曰“无言”；以明心见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实学。

——《日知录》七

舍“多学而识”，以求“一贯”之方；置四海之困穷不言，而终日讲危、微、精、一之说。

——《文集·与友人论学书》

同时他对于那先天图象的玄学，也曾说：

圣人之所以学《易》者，不过庸言庸行之间，而不在于图书象数也。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，畔也。……

希夷之图，康节之书，道家之《易》也。自二子之学兴，而空疏之人，迂怪之士，举窜迹于其中以为《易》，而其《易》为方术之书，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，去之远矣。

——《日知录》一

这两种趋势后来都有第一流人才加入，继续发挥。黄氏兄弟攻击象数之学最力；毛奇龄也很有功；胡渭的《易图明辨》可算是这一方面的集大成。心性的玄学在北方遇着颜元、李塨的痛剿，在南方又遭费经虞、费密等人的攻击。阎若璩指出古文《尚书》里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十六个字是出于《道经》的；这也可算是对那“危微精一”之学放了一支很厉害的暗箭。但当日的“反玄学”大革命，简单说来，不出两个根本方略：一是证明先天象数之学是出于道士的，一是证明那明心见性之学是出于禅宗的：两者都不是孔门的本色。

反玄学的运动，在破坏的方面居然能转移风气，使人渐渐地瞧不起宋明的理学。在建设的方面，这个大运动也有两种趋势：一面是注重实用，一面是注重经学：用实用来补救空疏，用经学来代替理学。前者可用颜李学派作代表，后者可用顾炎武等作代表。从颜李学派里产出一一种新哲学的基础，从顾炎武

以下的经学里产出一种新的做学问的方法。戴东原的哲学便是这两方面的结婚的产儿。

颜元（一六三五～一七〇四）主张一种很彻底的实用主义。他自己经过乱离的惨痛，从经验里体会出宋明儒者的无用；不但主静主敬是走入了禅宗的路，就是程朱一派拿诵读章句作“格物穷理”，也是“俗学”而非正道。他自号为“习斋”；习即是实地练习。他说，“格物”的物即是古人所谓“三物”，三物即是六德、六行、六艺。古人又说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，谓之“三事”；事也就是物。他说：“道不在章句，学不在诵读；期如孔门博文约礼，实学，实习，实用之天下”（《与陆道威书》）。他最恨宋儒不教人习事而只教人明理。他说：“孔子则只教人习事。迨见理于事，则已彻上彻下矣。”（《存学编》）；他因此极端崇信孔子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的话，以为那是“治民之定法”！他说：“空谈易于藏拙，是以〔宋儒〕舍古入六府六艺之学而高言性命也。予与法乾王子初为程朱之学，谈性天，似无齟齬。一旦从事于归除法，已多谬误，况礼乐之精博乎？昔人云：‘画鬼容易画马难’，正可喻比”（《存性编》）。画鬼所以容易，正因为鬼是不能实证的；画马所以难，正因为马是人人共见的东西，可以实验的。（李榕也引此语，并说：“以鬼无质对，马有证佐也。”）

颜元说，“学之亡也，亡其粗也。愿由粗以会其精。政之亡也，亡其迹也。愿崇迹以行其义”（《年谱》），这几句话最精当。宋人曾说儒门淡薄，收拾不住第一流的人才（见宗杲的《宗门武库》）。所以宋儒起于禅宗最盛之时，自不容不说的精微奥妙，才免得“淡薄”之讥。自宋至明的哲学史，除了陈亮、叶适一班人之外，只是与禅宗争玄竞妙的历史。颜元大胆地指出

他们说的太精了，太空了；他要人从那粗浅的艺学制度下手，从那可以实证的实迹下手。这是颜学的要旨。例如他说性，老老实实地承认“性即是气质之性”；“譬之目矣，……光明之理固是天命，眶疱睛皆是天命，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，何者是气质之性”（《存性篇》）。又如他论史事，很替王安石、韩侂胄辩护；他说王安石的新法“皆属良法，后多踵行”；他夸奖韩侂胄伐金之举是“为祖宗雪耻于地下”（《宋史评》引见《年谱》）。他论史事，颇推崇“权略”；他说：“其实此权字即‘未可与权’之权；度时势，审轻重，而不失其节，是也。……世儒等之诡诈之流，而推于圣道外，使汉唐豪杰不得近圣人之光，此陈同甫（陈亮）所以扼腕也。”这些见解都可以见颜元讲学不避粗浅，只求切用；不务深刻，只重实迹。

颜元的大弟子李塉（一六五九—一七三三）发挥师说，说的更圆满细密，但仍旧遵守这种“由粗”“崇迹”的主旨。例如他说“道”只是“通行”；“理”只是“条理”。“在天在人通行者，名之曰道。理字则圣经甚少。《中庸》‘文理’，与《孟子》‘条理’，同言道秩然有条，犹玉有脉理，地有分理也。《易》曰：‘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’；理见于事，性具于心，命出于天，亦条理之义也”（《传注问》）。他在别处也说：“以阴阳之气之流行也，谓之道。以其有条理，谓之理”（《周易传注》）。又说：“夫事有条理曰理，即在事中。今曰理在事上，是理别为一物矣。天事曰天理，人事曰人理，物事曰物理。《诗》曰：‘有物有则’，离事物何所为理乎？”（《传注问》）

宋明的理学家一面说天理，一面又主张“去人欲”。颜李派既以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”为主，自然不能承认这种排斥人欲的哲学。

李塉在这一层上，态度更为明显。宋儒误承伪《尚书》“人心维危，道心维微”的话，以为人心是人欲，是可怕的东西，应该遏抑提防，不许他出乱子。李塉说：“先儒指人心为私欲，皆误。‘人心维危’，谓易引于私欲耳，非即私欲也。”他又说：“今指己之耳目而即谓之私欲，可乎？……今指工歌美人而即谓之私欲，可乎？其失在‘引’、‘蔽’二字，谓耳目为声色所引蔽而邪僻也。不然‘形色，天性’（孟子语），岂私欲耶？”（《大学解业》）

宋儒自二程以后，多说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”两句话。致知一方面，程朱一派与陆王一派大不相同，纷争不了。但主敬一方面，无论是程朱，是陆王，总没有人敢公然出来否认的。颜李之学始大声疾呼地指出宋儒的主敬只是佛家打坐的变相；指出离事而说敬，至多不过做到禅门的惺惺寂寂，毫无用处。李塉说：“宋儒讲主敬，皆主静也。主一无适，乃静之训，非敬之训也。”他又引一位潘用微（宁波人，与黄宗羲、万斯同同时，著有《求仁录》等书）的话道：“必有事之谓敬，非心无一事之谓敬。”他又说：“圣门不空言敬。‘敬其事’‘执事敬’‘行笃敬’‘修己以敬’，孟子所谓必有事也”（以上皆见《传注问》）。当日一班排斥陆王而拥护程朱的人，如张伯行之流，都说陆王主静而不主敬，所以人于禅。李塉指出宋儒主敬都是主静。“主静立人极，周子之教也。静坐雪深尺余，程朱之学也。半日静坐，半日读书，朱子之功课也。然则主静正宋儒学也。”（《年谱》）。

颜李的学派和宋明理学的根本区别有两点：理学谈虚理，而颜学讲实用；理学主静主敬，而颜学主动，主习事，主事功。有人说程朱与孔孟“隔世同堂”，似不可排斥。颜元说：

“请画二堂，子观之。一堂上坐孔子，剑佩，觚决，杂玉，革带，深衣。七十子侍，或习礼，或鼓琴瑟；或羽龠舞文，干戚舞武；或问仁孝，或商兵农政事；服佩亦如之。壁间置弓、矢、钺、戚、箫、磬、算器、马策，及礼衣冠之属。一堂上坐程子，峨冠博带，垂目坐，如泥塑。如游、杨、朱、陆者侍，或返观静坐，或执书伊吾，或对谈静敬，或搦笔著述。壁上置书籍、字卷、翰研、梨枣。此二堂同否？”（《年谱》）

李塨也有同样的观察：“圣学践形以尽性。耳聪目明，践耳目之形也。手恭足重，践手足之形也。身修心睿，践身心之形也。践形而仁义礼智之性尽矣。今儒堕形以明性。耳目但用于诵读，耳目之用去其六七。手但用于写字，手之用去其七八。足恶动作，足之用去九。静坐观心而身不喜事，身心之用亦去九。形既不践，性何由全？此一实，一虚；一有用，一无用；一为正学，一陷异端：不可不辨也。”（《年谱》）

以上说清初的实用主义的趋势，用颜李学派作代表。颜李学派是一种反对理学的哲学，但他们说气质是性，通行是道，条理是理；说人欲不当排斥，而静坐式的主敬是无用的；说格物在子“犯事实做其事”，而知识在于实习实行；说学在于习行，而道在于实用（三物，三事），——这也是一种新理学了。在那个排斥玄学的空气里，这种新理学一时也不易成立。况且当日承晚明的流离丧乱之后，大家归咎于王学；程朱的学派大有复兴的样子。大师如顾炎武，他虽痛斥王学，而对于朱熹他始终敬礼。朝廷之上也正在提倡程朱；而在野学者的风气也与朱学“穷理致知”、“道问学”的宗旨很接近。所以提倡“实学”是多数学者所公认的，而攻击程朱是他们不能一致承认

的。况且当日南方的理学大师如张履祥，如吕留良，如陆陇其，都是朱学的信徒。陆陇其竟说：“愚近年所见，觉得孟子之后，至朱子知之已极其明，言之已极其详；后之学者更不必他求，惟即其所言而熟察之，身体之，去其背叛者与其阳奉而阴叛者，则天下之学无余事矣。”（《三鱼堂文集》六，《答某》。）在这个极端“述朱”的空气里，颜李自然成了叛教的罪人；颜李学派所以受排斥（江藩、阮元、唐鉴等人记载清代学术，都不提及颜李；方苞作李塨的墓志，竟说他后来不是颜学的信徒了；程廷祚是颜李的南方传人，而程晋芳为他作墓志，竟不提及颜李一个字。这都是颜李受排斥的证据），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

其次，当日反玄学的运动之中还有一个最有力而后来成绩最大的趋势，就是经学的复兴。顾炎武说：

……躁竞之徒，欲速以成名于世；语之以五经，则不愿学；语之以白沙阳明的语录，则欣然矣，以其袭而取之易也。

——《与友人论门人书》

他又说：

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。古之所谓理学，经学也；非数十年不能通也。……今之所谓理学，禅学也；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，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。

——《与施愚山书》

用“经学”来代替“禅学”，这是当日的革命旗号。“经学”并不是清朝独有的学术，但清朝的经学却有独到的长处，可以说是与前代的经学大不相同。汉朝的经学重诂训，名为近古而实多臆说；唐朝的经学重株守，多注“注”而少注经；宋朝的经学重见解，多新义而往往失经的本义。清朝的经学有四个特点：（一）历史的眼光，（二）工具的发明，（三）归纳的研究，（四）证据的注重。因为清朝的经学具有这四种特长，所以他的成绩最大而价值最高。

第一，历史的眼光只是寻源溯流，认清时代的关系。顾炎武说：

经学自有源流。自汉而六朝，而唐，而宋，必一一考究，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，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。如论字者必本于《说文》，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。

——《文集》四，《与人书》四

论字必本于《说文》，治经必本于诂训，论音必知古今音的不同，这就是历史的眼光。懂得经学有时代的关系，然后可以把宋儒的话还给宋儒，把唐儒的话还给唐儒，把汉儒的话还给汉儒。清朝的经师后来趋重汉儒，表章汉学，虽然也有过当之处，然而他们的动机却只是一种历史的眼光，认定治古书应该根据于最古的诂训；汉儒“去古未远”，所以受他们的特别看重了。

第二，清儒治经最能明了“工具”的重要。治经的工具就是文字学（包括声音、形体、训诂等项）和校勘学。顾炎武曾说：

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。以至诸子百家之书，亦莫不然。

——《答李子德书》

考文是校勘学的事，知音是文字学的事。后来这两种学问陆续增长，多所发现，遂成两种独立的科学。阎若璩说：

疏于校讎，则多脱文讹字，而失圣人手定之本经。昧于声音诂训，则不识古人之语言文字，而无以得圣人之真意。

——臧琳《经义杂记序》

清朝的经学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绩，全都靠这两种重要工具的发达。

第三，归纳的研究是清儒治经的根本方法。凡比较同类的事实，推求出他们共同的涵义来，都可说是归纳。例如，《尚书·洪范》，“无偏无颇，遵王之义”；唐明皇改“颇”为“陂”，好和“义”字协韵。顾炎武说他：

盖不知古人之读“义”为“我”，而“颇”之未尝误也。《易·象传》，“鼎耳革，失其义也。覆公餗，信如何也。”《礼记·表記》，“仁者右也，道者左也；仁者人也，道者义也。”是义之读为我。而其见于他书者，遽数之不能终也。

——《答李子德书》

比较《易·象传》、《表記》、《洪范》……而推得“义之读为我”的共同涵义，这便是归纳的方法。黄宗羲作万斯大的墓志，曾说：

充宗（斯大的字）……湛思诸经，以为非通诸经，不能通一经；非悟传注之失，则不能通经；非以经释经，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。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？经文错互，有此略而彼详者，有此同而彼异者；因详以求其略，因异以求其同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。何谓悟传注之失？学者入传注之重围，其于经也无庸致思。经既不思，则传注无失矣，若之何而悟之？何谓以经解经？世之信传注者，过于信经。……“平王之孙，齐侯之子”，证诸《春秋》，一在鲁庄公元年，一在十一年，皆书“王姬归于齐”。周庄王为平王之孙，则王姬当是其姊妹。……毛公以为武王女，文王孙；所谓“平王”为平正之王，“齐侯”为齐一之侯，非附会乎？如此者层见叠出。充宗会通各经，证坠缉缺，聚讼之议，涣然冰泮。

——《南雷文定前集》八

这里所说“通诸经以通一经”，“以经解经”，都只是把古书互相比较，求出他们相互的关系或共同的意义。顾炎武等人研究古韵，戴震以下的学者研究古义，都是用这种方法。

第四，清朝的经学最注重证据。证据是推理立说所根据的东西；法庭上的人证与物证便是判断诉讼的根据。明朝陈第作

《毛诗古音考》(一六〇一~一六〇六),全书用证据作基础;他自己说:

列“本证”“旁证”二条。本证者,《诗》自相证也;旁证者,采之他书也。

——《自序》

如他考“服”字古音“逼”,共举出:

本证十四条,

旁证十条。

顾炎武作《诗本音》,于“服”字下举出:

本证十七条,

旁证十五条。

顾氏作《唐韵正》,于“服”字下共举出一百六十二个证据(卷十四,页二七~三三)。为了要建立“服,古音逼”的话,肯去搜集一百六十个证据,——这种精神,这种方法,是从古以来不曾有过的。有了一百六十个证据,这就叫人不得不相信了。陈第、顾炎武提出这个求证据的方法,给中国学术史开了一个簇新的纪元。从此以后,便是“考证或考据的经学”的时代了。

总而言之,清初的学者想用经学来代替那玄谈的理学,而他们的新经学又确然有许多特殊的长处,很可以独立成一种学术。自从朱熹和陆九渊分门户互相攻击以来,陆王一派的理学家往往指训诂章句之学为“支离”,为“琐碎”;所以聪明才智之士往往不屑去做经学的功夫。顾炎武以后的经学便大不同